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上接 03 版)

第二个困难,协调预期中的囚徒困境。我们要从旧的规则转到新的规则,但是谁先转到新规则,就有可能吃亏,谁守住旧规则就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就是流氓优势,这个流氓优势没有任何道德贬义在里面,完全是道德中性的。**只有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认识到旧规则的低效和非稳定性,探索和建立新的规则,这就是现代社会转型困难,难就是难在我们的思想意识。**

前面这部分介绍文献、理论的框架和概念,后面讲一下世界上的现代化转型。我把现代化转型分两个组,这两个组和摩尔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我的着眼点和摩尔不一样。摩尔的着眼点是前工业化社会的状态、传统社会的状态、特别是农村的状态。我的出发点是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结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先把英国和法国放到了一边。我认为英国、法国基本上是自发地转入到现代化过程,而其他国家是在英国之后,被迫开始现代化转型。英国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迈克法兰把英国现代化一直推到了 14 世纪,我们一般认为英国现代化转型从 18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有的人推到了 17 世纪的光荣革命。

英国之后世界上其他民族没有选择,只能跟着英国进入现代化。为什么?就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效率,大英帝国用他的枪炮、贸易、产品证明了现代社会的优越,其他民族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过来。转型的开始都是外部战争的失利。德国的现代化转型应该是 1807 年拿坡仑战争开始。拿坡仑战争中,号称当时欧洲最精锐的普鲁士陆军,被拿坡仑的农民军打得一败涂地,普鲁士几乎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了改革。日本的改革启动现代化,1853 年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之后西方列强相继而至,这是明治维新的序曲。俄国 1865 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迫使俄国进行两次自下而上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和尼古拉沙皇的改革。中国开始尝试现代化是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由于这些国家现代化转型启动都是战争引起,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表面上看是国防、民族独立,但是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体现在统治精英的地位在外界冲击之下严重动摇,变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精英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例外,都是原来的皇朝,封建的也罢,专制的也罢,为了维持统治地位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德国历史学家韦勒讲,德国 1807 年进行的改革是防守性的进攻,是向前逃跑;统治精英为了保住他的特权地位,必须解决英国压力下的民族独立问题,必须解决国民安全的问题,如果他不能解决,他的合法性就没有了。这些统治精英在德国包括王室、容克土地贵族、军官、官僚和知识精英,在日本是经济发达诸藩的大名、贵族、知识分子和武士,在俄国是皇室和高级行政、军事官僚。要改革就是要改革财政,不然没有办法购置昂贵的武器和装备,所以必须实现财政现代化,才能推行军事现代化,从一开始经济现代化就从属于政治目标。

思想观念上,这些国家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讲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和种族主义重合。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民族主义在英国是非常清楚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这是英国最早的现代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到了德国、到了日本就变成了国家主义,甚至演变成了种族主义;演变过程中,个人权利变为了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到了德国就变成了种族主义,个人利益不知不觉就抽象成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是什么?国家利益就是对外战争获胜,人民利益是被君王统治。**日本不是在美国大炮轰击下过日子,而是在天皇奴隶般的统治中过日子,这就成了人民利益。国家主权代替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代替了早期现代社会的人权。这个民族主义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诠释它。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工业化、城镇化。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财政收入,再由财政支撑军事和国防的现代化,获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强化统治精英的合法性。统治精英受到挑战主要是在外部战争中失败受到挑战,因此,军事现代化后面跟着的是财政现代化,财政现代化后边又跟着工业和经济的现代化,都是为了强化统治精英的合法性。这些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确实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巩固了统治精英的地位,不仅如此还巩固了集权寡头政权和国家主义的观念,推迟了政治现代化。子系统内在的不协调孕育了更大危机。

这样的局部现代化,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先工业化、城镇化,而在政治领域中基本不动,统治精英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因为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和军事的现代化,外部威胁已经解除了。所以,没有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外部压力,那更谈不上内部的动力。民众觉得干得不错,明治政府干得不错,明治政府不仅 1894 年打败大清帝国,而且 1905 年打败了当时世界三强之一的俄罗斯帝国,政治改革干什么?所以局部现代化获得成功反而延迟了其他子系统的现代化。在观念方面,没有人想到个人权利,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的子民们从来没有想到个人权利,日本人当时的心态是我们现在也成了世界强国了,一种内部民族的自豪感使得他们完全忘记了现代社会,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现代社会观念体系中最重要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这种局部的现代社会展现出了一定的效率,但是他的稳定性越来越成问题。通过经济现代化,内部已经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但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没有多元格局,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阶层,工商、金融、资本家、工人都要求政治参与,但是统治精英拒绝分享权力。这使得与新阶层矛盾日益激化,而没有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就走向非制度化和极端化的解决方案。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通过 2.26 事变把大众民主制度推翻,尽管没有革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大众民主。德意志帝国体现在希特勒,体现在威廉二世身上,都是极端化解决方案。亨廷顿讲工业化速度越快,社会政治秩序、政治结构的变化就越激烈。因为对比自然演化,像英格兰几百年的自然演化,子系统之间有相互适应协调的时间和空间,而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因此社会结构的演进往往采取很激烈甚至暴力的形式。回过头看中国的工业化,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调节其他的子系统。

局部现代化的脆弱性,还体现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对外政策必然是强硬的,因为观念子系统变成了民族主义,在这面大旗之下,对外政策只有强硬。同时由于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又使这些国家具备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军事实力,因此变得异常危险。二战、一战爆发都是这种体现。

下面我讲具体的案例。第一类现代化,我在这里放了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就是由封建转型为现代社会。在这里我不像摩尔那样强调农业部门的社会结构,而是强调它的政治体系特征:由封建社会转型的德国和日本,它们的道路非常类似。维护统治精英的特权,政治体制呈现刚性,在观念子系统中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价值再造,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社会,但缺失了个人价值,强调的是集体而非个人价值,强调的是国民义务,而非公民的自由,只不过把过去效忠的对象从领主和家族变成了皇帝和国家。因此他的价值再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没有确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从封建价值变形过来,在转的过程中丢失了现代价值观的精髓,就是个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

经济保留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因为统治精英依靠的政治力量都是有产者,他不可能否认私有制。但是,这个私有制是带有德国特色、日本特色的私有制。由于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商界和政界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演进过程不像在英格兰,在英格兰商界和政界经常处于一种紧张和冲突的状态下,能够形成社会的多元互相制约,而在第一类现代化过程中,商界和政界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政界把商界看成他的工具,而商界依赖政界获取超额利润。我们在这里要经常对照英格兰,对照自然演化现代化的样本,才能够看到德日现代化的问题。有限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强管制的市场经济也发挥了很强的效率,这和中国和俄国又形成了对照,中国和俄国现代化基本没有私有制的事实,或者没有达到德日那样的规模,因此中国和俄国现代化产生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德国和日本。

它的特点和英格兰的经济现代化不同,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政府支持下的日本财阀,是政府鼓励下的德国的卡特尔、大的工业经济集团形成,政府提供保护,利用现有技术进行赶超,所谓的后发优势。**杨小凯讲后发劣势,我深表赞成,我不认为有什么后发优势。从长的历史来看,后发国家是有很大劣势的。**

小结一下,第一类国家现代化转型子系统之间不协调。子系统之间不协调的关键是民族主义,不是英格兰原有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德日版本、中俄版本的民族主义。它并不是对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认同,而是对抽象的民族利益的追随,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和英格兰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政治上是精英寡头竞争,再加上皇权,德意志皇帝和日本天皇,但实际的政治权力在精英寡头手里,这些精英寡头形成竞争态势。经济上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但是经济界、金融界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把它叫做政商协同。它的子系统不协调主要在经济子系统和观念子系统之间,在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之间是不协调的,这个不协调限制了经济效率的发挥。另一方面,经济领域中产生出来了多元利益又不能认同精英寡头对权力的把持,工商金融人士、律师、会计师等这些专业人士、工人阶级,都要求政治参与,而传统的精英拒绝和他们分享权利。我们看一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看一下俾斯麦做什么事情?就是一手打击资本家,另一手打击工人,你们谁都不要染指我的禁区。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关税保护,我给你。你想要政府定单,我给你。不许挑战我的权威。跟工人阶级说,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养老金,我给你。你想要社会保障,我给你。不许挑战我的权威。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新兴阶层和传统统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各种党派混战一场,最终使得第二帝国走向极端化道路。所以,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是不兼容的。你谈的是民族主义,你谈的是民族利益,对不起,我要提高工资。对不起,我要扩大我的企业。我的利益是具体的,别老跟我说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你别老跟我说这个。所以局部的现代化,虽然给了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财政,但是它不能解决这两个子系统,而且还在制造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增加了它的张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脆弱的均衡很快地变成了失衡。有限的政治多元,回归到单极力量,形式上,在德日第一类现代化国家中存在着议会和政党,但是真正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掌控在皇室、贵族和元老手中,不可能做到分享。一方面是工业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要求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传统精英要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如何实现平衡?完全靠个人技巧。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俾斯麦是很能干的人,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可以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俾斯麦做得已经很困难了,11 个锅 10 个锅盖,倒腾来倒腾去,最后还是倒腾不过来。随着俾斯麦被解职,多元很快就变成了单极。在军方和威廉二世的大力推动下,权力向一个小集团集中,这个小集团就是五六个人,以威廉二世为核心的几个人就决定了国家的政策。同样,在明治出现了同样的局面,明治元老纷纷去世之后,军部依靠天皇的精神权威,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短暂的多元化不能够达成纳什均衡,这个脆弱的局面很快地向一极化、单极化过渡。在观念体系上,民族主义加速了军国主义的抗张。

当然,还有外部问题,就是横扫西方的 1930 年代经济大萧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变得军事化,而非军队的国家化。高于一切的民族利益解除了中产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武装,集权获得广泛支持,日本军部在日本集权得到民众广泛支持。9.18 事变,日本国内一片叫好,不断扩大对华战争,都得到了国内舆论和民众支持。这是因为它的观念子系统上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对内的集权和对外的扩张,民众认为是摆脱萧条的有效途径。由于缺乏个人权利意识,没有学会制度化的解决国内利益冲突,最终当大萧条打击到德国和日本的时候,形式的民主就已经结束,让位给军部和皇室的集权。

结果是使得对外政策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由于权力的集中,由于缺乏制衡,它的对外政策非常地危险。当然这些对外政策,今天看是非理性的,实际上它有一定理性因素驱动,这个理性因素就是国内政治。**俾斯麦 1864 年发动对丹麦战争,1866 年发动对奥地利战争,看上去都是外战,而实际上都有内部的深层次考虑。**俾斯麦要协助普鲁士国王,那时候德意志帝国没有成立,要协助普鲁士国王获得对军队的控制,增加军费,但是受到议会的抵制。当时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已经进了议会,增加军费,让我们交税,凭什么?不同意,俾斯麦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说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才能够获得军费的增加,才能够迫使议会就范。当时普鲁士议会的权力很有限,他只能够投反对票,不能够提出议案,但是在政府提出预算的时候,议会有否决权,所以他是被动地行使权力。于是俾斯麦连续发动两次战争,对丹麦和对奥地利的战争,两次战争获胜使俾斯麦在国内声望大增,议会在战争胜利压力下,事后追认俾斯麦扩军和增加军事预算合法。所以对外战争都有内部的考虑。1912 年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选举中获得大胜,保守势力和皇帝结成爱国主义阵线,怎么样去压制社民党的势头,一个出路就是对外战争,但是没想到对外战争毁掉了德意志帝国。

日本军部在一战结束之后一再鼓吹要进行总体战,目的是扩大军部的影响,增加军部的势力。当日本军部获得政策实际主导权,日本的文官哀叹现在没有人能够约束军部了,只有国民,但是国民不想,也无力制约军部,军部走上对外扩张,而且赌注越下越大。**今天历史学界有一致的观点,日本的失败是从 1931 年的 9.18 事变,并不是偷袭珍珠港,偷袭珍珠港只是 9.18 事变的延续。**1931 年的 9.18 事变就是由军部下层军官挑起,刚开始军部还压制,到后来军部发现不用压制,就让他们干,结果是军部在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二类现代化,它的前现代化状态是皇权官僚专制,皇权官僚专制最终演变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这个演变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专制皇权改革没有成功,被革命终结。第二个阶段,革命之后建立斯大林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的体系是内在兼容的,毛泽东的体系是内在一致的,邓小平的体系是内在不一致的。尽管我们拥护改革开放,但从学术讲,体系的兼容性非常清楚。

斯大林主义的内在兼容性我没有时间讲了,但是这个体系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效率低下,他输在了效率上,不是子系统的不兼容、内部产生张力导致下一步制度的变化,不是的,而是由于效率的低下。**效率的低下,从苏联帝国的垮台就能看到,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归根到底在于斯大林主义体系的低效率,这个低效率使苏联对外不能应付和西方的冷战,经济无法负担长期军备竞赛而垮掉。**苏联为什么从东欧撤军?实际上是财政出问题,财政背后是经济的低效率。对外不能承受长期的军备竞赛,对内不能满足民众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这个帝国解体了。

吸取了苏联的教训,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部分改变了经济子系统,变成了半市场半国有。于是问题出来了,和政治子系统不兼容,和观念子系统不兼容。这个不兼容性,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下一步的演化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提供一个框架,供大家讨论问题。 (完)

如果媒体的报道是可信的,所谓的千禧一代是当前人们记忆中最惨的一代。

新兴市场千禧一代收入更高

千禧一代可粗略定义为出生于 1985 年到 2000 年的一代人。在一些人(至少包括千禧一代自己)看来,这个群体面临格外黯淡的财务前景,高房价、学生债务、低工资和竞争极度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都为他们的前途蒙上阴影。但如果这个论断中有任何真实成分的话,这似乎也是一个第一世界的问题。在新兴世界,千禧一代过得很不错,处于阴影之中的看上去反倒是他们父母那一代人。

在一批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现在 25—29 岁人群的总收入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收入差在菲律宾最大,25—29 岁的人的收入平均比普通菲律宾人高 19.7%,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墨西哥,这一收入差百分比也达到了两位数。泰国、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的这种收入差虽然更小,但依然显著,在新兴市场世界中,唯有韩国与这种趋势不符(不过有些人会把韩国界定为发达国家)。以上数据由欧睿国际发布,美国投资机构资本集团编制。

诚然,"总收入"的定义并不仅仅包括工资,这个概念也将投资、汇款和福利考虑在内。千禧一代可能是接受最多福利的人,至少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就是如此。但有子女的夫妻中一方(大多数情况下是妻子)赚取全职工资的能力下降导致的收入下滑,很可能会超过他们获得的福利。

汇款和投资收入更有可能流向年纪更大的人群——那些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或者积累了可观财富的人。此外,新兴市场里 20 多岁的年轻人的处境和西方同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图所示,就总收入而言,美国 25—29 岁人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1.5%,英国 25—29 岁人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6%。德国的千禧一代处境最好,收入差基本为零。

对于新兴市场的年轻人处境如此之好的原因,分析人士普遍指向了近年来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这主要要归结于教育。如果你看一看中国或者印度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们很可能拥有学位或者至少接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情况不同。"资本集团的投资专员马丁?霍尔说。莫斯科投行晋新资本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罗伯逊说:"平均而言,现在许多 54—65 岁的人的教育水平不如 25—34 岁的人。"

尽管在这方面发达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新兴市场教育水平提升速度要快得多(虽然起点较低)。"在 1980 年,巴西只有大约 30%—45%的(适龄)人口在上中学。因此现在 65 岁的人超过一半只上到小学。我敢肯定,很多 55 岁的人也是如此。"罗伯逊说。"在俄罗斯,现在 55—64 岁的群体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下,而非市场经济下受的教育。现在一些年轻人有学位,还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霍尔认为,考虑到父母日益重视教育,更年轻的劳动者比更年长的劳动者赚得更多的趋势不会是一次性调整,还将持续更长时间。

这一点在韩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韩国父母在私立学校教育上投入了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可以说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按照这种方式教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是大多数家庭难以承受的,霍尔说。但即使是在地球另一边的巴西,也"有数百所私立学校"。"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有些国家上大学的人数依然远低于西方,因此我预期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他补充。

有些人认为,人口趋势可能也促进年轻劳动者赚取更高收入。罗伯逊称,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相比 10 年前,15—24 岁的人口数量正在缩水",这意味着就业市场对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需求更旺盛,他们可以抬高工资。

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确是这样,年龄 18—29 岁之间的人口数量由 2010 年的 2840 万人下滑至 2015 年的 2440 万人,与此同时 30 岁—59 岁的人口数量小幅增加至 6310 万人。

考虑到 9—17 岁年龄段中的每一岁的平均人口为 133 万,而 18—29 岁每一岁的平均人口为 203 万(但 0—8 岁每一岁的人口为 173 万),上述趋势很可能延续。

尽管中国于 1980 年引入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这种趋势目前尚未出现。中国 18—29 岁年龄段中每一岁的平均人口为 2140 万,自 2010 年以来一直未变,比 30—59 岁每一岁的平均人口略高一点。然而,该趋势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目前中国 9—17 岁每一岁仅有 1630 万人。

尽管如此,霍尔称,资本集团已经听说过"一些非常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我们和一些在中国经营的机械制造公司谈过。它们不得不涨薪 10%—15%以阻止员工跳槽。"他称这种趋势在某些与消费者相关的部门也很明显。霍尔假定,中国眼下可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曾一度取之不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池正在干涸,工资水平迅速上升。

这引发了几个有趣的问题。千禧一代的收入超出平均水平,对面向年轻人出售商品的企业来说应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年轻人收入丰厚的部分原因是年轻人更少了,那么这种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它带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年龄增长,现在待遇丰厚的千禧一代将看到自己的相对工资下滑,更年轻、更聪明的劳动者将更加抢手——这与发达世界的传统模式正好相反,对某些人来说在心理上可能很难接受。

罗伯逊不认为千禧一代的收入会下滑(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但是他补充称,"人口结构特征和教育水平提高意味着,这些国家当前 10 岁的孩子们前景光明"。

安石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主管简?德恩警告称,考虑到未记录在案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新兴国家十分发达,收入数据可能并不完全可信。

话虽如此,在他看来,千禧一代的崛起印证了他对新兴世界的信心。德恩认为,随着时间推移,新兴市场的人均国民收入应该会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趋于一致。德恩提出,目前年龄在 25—29 岁之间的人,是在后冷战时代出生并受益于千禧年以来出现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第一代人。"这是在比较稳定、富足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第一代人,(新兴国家)可以吸引外国资本,因此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他称。至于千禧一代今后是会发展得越来越来还是逐渐走下坡路,德恩补充称:"按相对价值计算,他们应该一代比一代穷,但是按绝对价值计算,他们应该会越来越富有。"

(FT 中文网)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三环路北一段成彭立交内侧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 3 号 5 号楼 电话:(010)87721045 52896956 52896958 87527365(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